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



郝苏民 总主编

文化魔力：
从人到群·族群
与民族之间

满珂 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

郝苏民 总主编

文化魔力：
从人到群·族群
与民族之间

满珂 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魔力:从人到群·族群与民族之间/满珂编.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3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系列/
郝苏民主编)

ISBN 978-7-311-02949-4

I. 文... II. 满... III. ①蒙古族—调查报告—中国②回
族—调查报告—中国③藏族—调查报告—中国④东乡族—
调查报告—中国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196 号

出 版 人 陶炳海

策划编辑 穆敏

责任编辑 刘暄

封面设计 赵会

书 名 文化魔力:从人到群·族群与民族之间

作 者 满珂 编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72 千字

印 数 1~1100 册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2949-4

定 价 1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总 序

邨苏民

23年前,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1984),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所名还是其时国家民委领导批定的。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当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干部的迫切急需成为一切的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学院,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西北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办学个人,它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们是一个极大鼓舞。1984年西北民院西北民研所的创办,便是当时本院民族学与教育工作者学术心愿的首次圆梦!

发展的道路又总是曲折的。意外的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却带来了所谓“全民下海”(单位创收)的冲击,一时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上的第一桶金,曾诱惑了不少当时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希冀重建人类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设等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凡此直接涉及到成员们工作量、课时、

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民族性老校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时代使命的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理性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实话实说,这些本为教育、办学内行领导的例事,却在引进何人、该谁来办事等人事关系上纠缠不前。这里的专业人员一时被这些“不大不小的问题”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空待大好时机的流失……

事情原本还有另一面,当时,一是全国高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二是部分研究者受全国学界大好形势感染不甘心无所作为去坐地搞“创收”。经过彷徨、内外沟通、酝酿,再经过“年年五月换领导”的“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领导的支持,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整整几个年代的整合队伍,研究所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代价,仅从其中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西北民研所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所合一的机构。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这个“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教学空白;也在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的学科建制化。不久,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与北大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第六届高研班。费先生煞费苦心,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对开发西北的研究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题讲演;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的意义。他语重心长、苦口婆心,这给我们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钟敬文、马学良、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惟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即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鉴于我们对中国

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含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的开办,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为以往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的惯例,以每位研究生的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06年,这个教学点共招生了13个民族的110多名学生,已毕业者近三分之二以上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对象,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博、“进站”。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近年来,在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内民俗部分的任务中,更坚持了研究生们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语言无障碍的优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的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的成果,累累结枝。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的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惟以“民间文学”以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地发展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 student 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士生都

在培养之中。

这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在大开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除涉及到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到除大西北外的内蒙古、四川、湖北、福建、山西、山东,甚至东北各地。在物质条件极不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经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又一个十年教学实践使我们自认为:虽也无法回避此法,此路离幸得领导“助人成功”好运终有距离的艰辛事实,但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路子,亦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学术经验。

当前,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似乎出于“冷思考”地把高校分类为几种发展类型,学校被划进某个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游戏”。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去存在、发展,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层皆为内行、教授的现状下,其自主趋势如何发展,目前难以明朗。故,大抓学科建设、学科凝练之云的真正落实,看来确实在于是否哪级所属,与在不在某种“工程”之内大有关系;至于教授今后走向,也和你现属哪块“风水宝地”关联在一起!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全关乎到群体、社会、人类的大范围,但似乎此类学术属性,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幸运;却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地被其时认同过;“助人成功”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汗水的播种。于是,我们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的形式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方激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

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皆心同此理吧。若幸甚而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需交代的是，“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挤入“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它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銜，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广大读者了。

第一本集子，曾承蒙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博士建议配合“基础数据库”中民俗部分的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其余三集由兰州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分别由老中青等策划、主编，青年教师马忠才、满珂等博士热情协助。西北民大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出版社责编先生们的慧眼、支持、辛苦都是感动于心的。我们：主编、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了。

是可为序乎？如此而已。

于金城沙痕书屋 寓所

2006年12月岁末

2007年元月修订

目 录

1. 河南省蒙古族的生存现状与民族认同心理 满 珂(1)
2. 走在蒙回的边缘
——野牛村“托茂家”田野民俗志调查与研究 杨德亮(28)
3. “家西番”: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卢兰花(85)
4. 兰州市“东乡村”民俗生活适应与变迁的调查..... 白晓荣(128)

河南省蒙古族的 生存现状与民族认同心理

满珂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秦汉以后形成的汉族人,在今河南境内生活、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占河南省人口绝对多数的民族。他们以农业为本,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并使以此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该地区居于主体文化地位。但就在这汉文化辉煌灿烂的地区,却存在着有一部分人们印象中应该活跃在北方草原的蒙古族人。据说他们已在内地留居了六七百年,繁衍二十几代人。那么,经历了与母体文化几百年的关山阻隔,他们的生存现状和民族认同心理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1999年7月到8月间,笔者在这部分人的主要聚居区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并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

一、河南省蒙古族概况

1. 全省蒙古族概况及族属被认定过程。根据1990年的统计数据,河南省共有蒙古族65814人,分别占全省总人口数、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数的0.08%和6.5%,主要分布在豫中南的平顶山市、豫西南的南阳市所属各县,其中以南阳市镇平县最为集中。就其来源来看,河南省的蒙古族可分为三支:以平顶山市荆山村为代表的元朝蒙古侍卫亲军千户马秃塔尔的后代,以镇平县晁陂镇为代表的元朝皇室后裔,以镇平县砚台村为代表的元朝官宦之后。解放前,这三支蒙古族都未明确提

出自己是蒙古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荆山人在进行户口登记时填报了蒙古族;“1953年元月,中南民族访问团到达南阳地区,把镇平县蒙古族的历史情况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详细调查,收集到家谱四个,碑文一篇,还有其他口碑资料,最后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了长篇调查报告,并把四个家谱的序言部分照录下来。根据当时所掌握的碑文、家谱、传说等资料,确认他们为蒙古族人”。^①

2. 作为具体考察对象的河南省蒙古族概况。为了方便而科学地进行调查、研究,笔者选取各支蒙古族的聚居村落荆山村(后简称荆村)、晁陂镇街南村(后简称南村)、砚台村(后简称砚村)为调查点,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其结果应该能够反映河南省蒙古族的基本面貌,同时因砚村与南村的情况十分相似,所以对砚村的调查从简。三村蒙古族的基本情况如下:

(1)人数、来源及依据。荆村现有蒙古族1230人,南村有1006人,砚村有1920人,据说三地蒙古族都是元末明初进入中原的蒙古族的后裔,可见依据有家谱、碑文、地方志中的记载。荆村蒙古族的远祖是元朝一位名叫马秃塔尔的高官,故其后代以“马”为姓。荆村现保留有从元代遗留至今的历代墓碑40多通,述及其源流的主要有3通。马秃塔尔墓碑正文曰:“大元故宣武将军,右翊蒙古侍卫亲军千户,可赠昭勇大将军、佥书、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范阳郡侯,马秃塔尔。至正己丑年仲冬季旬七日。”荆村马氏第十一代祖马一贯的碑文云:“叶县(荆村原隶属叶县)西北,离城十五里,荆山马秃塔坟墓记:秃塔元系殿前大将军,追封范阳郡侯,年久日深,钦封颓坏。有继世孙马隆生马起,起生宣,宣生云,云生生员一贯……崇祯二年三月十二日立。”乾隆三十一年“附记碑”中载:“先始祖范阳侯,有功于元,赐葬荆山。明兴,马氏子孙,俱以胜国名臣之后获罪新朝,因仆莖中碑石及一切天禄、辟邪,翁仲之属而埋之,隐姓名不仕,久而失记……”另外,在《叶县志》中也曾谈到“马秃塔尔”,《(嘉靖)叶县志·卷一·陵墓》载“秃塔尔,元千户,封范阳郡

^① 马迎洲、吕廷显、郭国志、张益民编著:《河南省少数民族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侯”。《(康熙)叶县志·卷六·流寓》中说:“马秃塔尔,里籍未详,疑是蒙古色目人,至正间累官昭勇大将军金书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范阳郡侯,今县荆山下为其故里。”南村蒙古族的始祖据说是元顺帝之四子帖木花耳,因祖先是“王”,故后代以“王”为姓,现在可见的他们称蒙古族的唯一证据是刊印于1942年的《王氏族谱》中的记载:“我王氏鼻祖世远年湮,文献无征,谨据:世祖墓碑载‘昔元纪,自文宗殂,顺帝御极,明主由和阳渡江,取太平路,逼燕京,元帝奔应昌,遂移祚,公气运迭嬗,克自保重。游冀北,走覃怀,率江左,渡河南,偕先大人经历殆尽,卜居晁陂’,玩其语意,我先人之出自蒙古无疑也……我镇平晁陂王氏宗自蒙古乃元胄也……历观往事种种可据,吾族其果为奇渥温铁木真之苗裔耶。”^① 硯村蒙古族与南村蒙古族同姓不同祖,“刻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的硯村祠堂碑云:‘(其祖先)祖籍东北辽宁锦县金城人,讳脱朮儿……’(碑已无存,碑文系手抄本摘录)”^②

(2)文化程度、家庭类型:三地蒙古族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家庭多是由一对夫妻及其一两个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

(3)对本族历史的知觉情况:三地蒙古族对自己的来源历史大都知之不多,晓之不深,有些人甚至对谈论这些事情十分反感。

二、河南省蒙古族的生存现状

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最能显示出一个民族的特点,笔者以此入手对调查对象进行考察,记录下了他们的生存现状。(由于南村、硯村相距不足十里,各种情况极为相似,笔者的描述突出荆村、南村两种类型。)

(一)语言:语言是人们交流经验、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是区分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准。河南省的蒙古族已无人懂蒙语、蒙文,有的甚至不

^① 王金相收藏:《王氏族谱·序》,1942年刊印。

^② 马迎洲、吕廷显、郭国志、张益民编著:《河南省少数民族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知有蒙语、蒙文,而通用汉语、汉文,操豫方言中所在地的地方话。荆村蒙古族说豫中南地方话;南村、砚村蒙古族说豫西南地方话。

(二) 风俗习惯:河南省的蒙古族同当地汉族一样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营,表现在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日、信仰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当地汉族没有差别。

1. 生产民俗:生产经营是人类的基本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河南省的蒙古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人均不足一亩的田地上精耕细作,种植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粮食作物和以花生为主的经济作物,种子每年更换,从种子站购买良种。当地农谚曰“八月寒露抢着种,九月寒露想着种”,“寒露至霜降,种麦不慌张”。小麦一般在农历九月播种,次年六月末收获,除交纳一定公粮外,各家将麦子洗净、晒干,磨成面粉,备一年食用。玉米在农历六月底播种,九月即可成熟,亩产九百斤左右,新玉米下来,人们咥着煮熟的嫩玉米,吃着喷香的烤玉米,品尝到的都是丰收的喜悦。大部分玉米经晾晒,粉碎成玉米糝,做稀饭吃,还有的被深加工,磨成玉米面,蒸馒头用。花生于麦收后种在麦茬上,阴历八月收获。从地里刨出的花生还带着秧子、泥土,只能用手工处理——摘花生,这是个费工费时的活儿。有些性急的人发泄似的使劲在地上摔打花生秧子,花生就会从杆上落下来。他们把花生带壳煮着吃,或是把花生仁晾干,放入油锅中炸成咸花生米食用。这些都只是为了尝鲜,大部分花生要榨油使用,还有些则卖出换钱。晒干的花生秧子可以当作猪饲料。相比来说,荆村的机械化程度较高,小麦的播种、收割、脱粒已全部实现机械化,全村收麦时,不到三天,各户麦子就可以进仓。南村、砚村播种小麦还使用一种叫做“耩”的农具,“由耩架、耩杆、漏斗、耩腿和耩铧组成两腿耩或三腿耩。播种时,一般用牲口拉耩(或人拉),旁边有一个人牵引叫‘帮耩’。播种下耩前,扶耩的‘耩耙’,要定仓眼。播种时,耩耙摇耩,做到‘一千二净眼观三,紧三慢三猛一掂’,讲究耩身平稳,速度适中,种子下地均匀”。^① 收割

^① 转引自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小麦使用人力、镰刀。除农业生产外,荆村靠近城市,多数人家以从城里的大饭店拉泔水养猪为副业,贴补家用。还有用汽车、拖拉机载货、送人跑运输的。南村蒙古族则兼营玉器加工,多为家庭作坊,规模不大,还有的在集市上卖菜、卖水果或开店经商、出外打小工。砚村蒙古族多数人家做“玉活”(加工玉器)。

2. 消费民俗:消费民俗涉及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即穿衣、吃饭、居住、交通等基本的生活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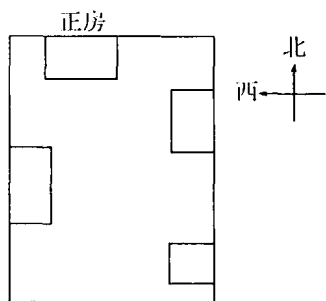
(1) 衣:河南省气候四季分明,河南省的蒙古族人每人大致有三类服装:冬装、春秋装和夏装。冬天,男子穿上穿厚毛衣,外罩中山装、西装或夹克衫、皮衣,下穿秋裤、毛裤,外套直筒裤,怕冷的人还备有棉大衣、羽绒服、棉帽子等。女子上穿厚毛衣,对襟棉袄,下着毛裤外加细腿健美裤或直筒裤,年轻女子有穿毛料裙子或皮装过冬的。春秋两季,男子改穿羊毛衫、薄毛衣,外套与冬天大致相同,只是下装中不穿毛裤。女子穿高领、低领秋衣或薄毛衣,双层夹衫。夏季,男子穿薄料衬衣、短袖和裤子,日常在家上身仅着汗衫或赤裸上身,女子同样穿容易透汗的衬衫、短袖、裤子。村民勤俭持家,必要时才会添些衣物,过年也只有小孩子换新衣服。南村、砚村蒙古族妇女冬天还有穿老式带大襟棉衣的,棉衣的左、右襟都宽至能护住身体前部,右襟在下,内里不塞棉花,起保暖作用的主要是左襟,衣服右腋下竖着缀一排扣子,一般是按扣。夏天,荆村除极少数时髦的年轻女子或小女孩外,妇女们一般不穿裙子,因为干活时毕竟不方便。南村因临街,许多妇女坐店经商,穿裙子的不少。

(2) 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的食物往往来自地之所产,有所产就有所食,因而,河南省蒙古族的饮食习惯以面食为主。他们一日三餐,早晨、晚上两顿稀饭,中午吃面条。早晨多食用面糊搅成的面汤,俗称“面疙瘩”,有时加一两个鸡蛋,吃馒头。有些人家还配上几样小菜,多是咸菜、豆腐乳和头天的剩菜。中午饭是一天的正餐,多食用面条,以蔬菜炒肉做成的“卤”佐餐。夏天,人们不爱吃肉,把面条和苋菜放到一起煮熟,拌上蒜汁、香油,就成了可口的蒜面条。晚饭以面汤、玉米糝、馒头为主,稀饭里往往加入红薯、红薯干调味。“红薯干、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正是河南饮食的一大特点。夏天晚上,多喜食绿豆汤,清

热败火，是防暑降温的美食。中午有时也烧稀饭，但对主食另有要求，往往要翻新花样，或烙饼、卷菜馍，或蒸菜包儿，吃的都是自己出产的时令蔬菜。有了喜事，或者改善生活，全家就坐在一起包饺子。饺子皮有梯形的，也有圆形的，馅有韭菜肉、韭菜鸡蛋、萝卜肉、豆角等，视各家自己的口味而定。包好的饺子放到“锅排”上，“形”（方言，定型）几分钟，或蒸食，或煮食。

（3）住：河南省蒙古族的房屋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老式起脊瓦房，为砖木结构，多建在高台上，设有走廊，房高屋深，以墙为支柱，墙上架梁，梁上立檩，檩上搭椽，脊上雕刻飞禽、走兽，门口安置石制、木制门墩。二是新式平顶房，整座房屋的墙体全部用砖搭造，顶部是钢筋水泥预制板，板上用优质水泥铺平，建成“晒台”，是晾晒农作物、乘凉的好地方。通向晒台的水泥制楼梯，有内置、外设两种，设在房屋一侧外部的较多。典型的农家小院往往包括正房、厨房、厢房、储存室等。正房又分为堂屋（客厅）和里间（卧室），紧挨着堂屋后墙放条几，几上供奉灵位，几前放桌，桌子左右置罗圈椅，墙上挂中堂字画。现在各家都有新型家具，如立柜、写字台、沙发、电视

机、自行车，室内摆设渐渐失去定规，由个人财力、审美观决定，但靠墙的条几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守在那里。荆村房屋依荆山山势，正房多东西走向，大门一般在院子的东部一角，与正房错开（如图），正房院子西侧为储藏室，猪圈、鸡舍，东侧为厨房、厢房。南村的院门（楼门）正对堂屋，所以楼门外砌一堵影壁墙，阻挡



路人视线。此处的平顶房多建成两层，楼下为客厅，楼上为卧室。临街楼房的一楼开辟成商店。蒙古族老人们还热衷于老式起脊房，认为它冬暖夏凉，住着舒服，年轻人则不以为然，把盖得起平顶房视为自己能力和财富的象征。

（4）行：河南省蒙古族所居处的交通比较便利，村民外出活动多依靠自行车，经济条件好的骑摩托车。荆村村中有柏油路通往市区；南村

紧邻 312 国道,搭乘小巴和机动三轮车都非常方便。

3. 节日民俗:同当地汉人一样,河南省的蒙古族一年中的主要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正月十六、二月二、清明节、五月初五、中秋节、十一月一、腊八节、腊月二十三(小年)等。春节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每年正月初一,各家早起鸣鞭炮开门,供奉祖先及天地之神,烧香、磕头,老少停止做活。自暮色朦胧开始,亲邻踵门相互道贺,谓之“拜年”;在外遇着相识故旧,握手道吉祥话。荆村的早餐一般是年三十晚上捏的饺子;南村则晚上吃饺子,早晨食用大肉、萝卜、黄花菜、粉条烩成的萝卜菜,饮“朝酒”(即黄酒,镇平名产)。中午两村都要由家里准备十几样凉、热菜,合家饮酒娱乐,互相祝福,老人们为儿孙发压岁钱。初一之日,禁忌尤多,不能动刀剪,不能倒垃圾,不能说不吉利的话,此日以家庭团聚为主,从初三“女儿回娘家”(南村蒙古族男性到外婆家)开始,凡属亲戚朋友,各备果肉(近年以饮料和酒、水果为主)往来交拜,并盛情招待,这种“串亲戚”活动在荆村一直延续到正月十六、十七,他们把正月初一到十五都称为“年下”,往后顺延一、两天也是可以的,但是初五早晨燃放鞭炮“破五”以后,人们逐渐回到日常生活状态,“串亲戚”就成为次要活动,集中在晚上或空闲时间。而南村从初三开始“串亲戚”,至初五日,年基本过完,初六日商人开集,一切便恢复正常,并且忌讳下午“串亲戚”,认为会给别人家带来厄运。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日,又叫元宵节,夜晚各家门前悬挂、摆放灯笼和灯盏,此日家中至少吃一顿汤圆,为的是有点节日气氛。荆村临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市里常举办灯会,荆村蒙古族也常开着拖拉机带着一家老小去观灯,给孩子们买回一些灯笼玩具。南村则要“照灯儿”,是红薯面捏成的窝窝,灌上油,插上灯芯,无论是鸡窝、牛棚,还是门墩、水缸上都要放一盏,小儿则拿着自制的“风葫芦”(一种迎风转动的小儿玩具)和买来的灯笼,在村中奔跑嬉戏。新女婿要到岳母家“躲灯”,并且要送 200 元烟火钱。正月十六在荆村是骡、牛、马等牲畜休息日,各家给牲畜卸役,喂些好料,感谢它一年来的辛勤劳动。近年机械逐渐代替畜力,此俗正在消失。南村给小儿挂麦戴蒜,愿小儿长命百岁。俗话说:“带个麦,活一百,带个蒜,活一万”。二月二是“龙抬头”吉祥日,俗以为从此日起,百物萌生,下雨时开始听

到雷声,也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荆村各家早点食煎饼,并以此日理发“龙剃头”为最吉祥。南村家家炸玉米花,称为“炸蝎子爪”,纺花弦,叫做“拉龙筋”。三月里有清明节,人们携纸烛酒馐和煮至半熟的肉,到祖先坟上祭扫,并对祖坟添土修整、压纸,南村这日还要采集柳条,插到门框等处,夏天喝茶用。当日,在家里不能洗衣服,据说是为了避免招惹蚂蚁。五月五日是端午节,各家门首上插艾枝以避毒邪,吃粽子、鸡蛋,煮大蒜,饮雄黄酒,还用雄黄酒滴小儿耳孔以解毒,给小儿佩带香囊。南村谚曰“癞蛤蟆,躲端午”,闺女得回娘家住两三天,同时为小儿缠五色线。六月六日,剪掉五色线扔到水沟里变“长虫”(蛇)。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各家以月饼为礼物串亲访友。荆村蒙古族不以月饼“愿月”(拜月亮)。十月一,俗称“鬼节”,清明节“放鬼”,此日“收鬼”,故曰“早清明,晚十来一”,祭奠祖坟的时间宜迟不宜早,否则会引起祖先的不满,从而致厄于人。南村蒙古族这日要做些油炸食品,向祖先献祭。十二月初八日,是为“腊八节”,各家早点以八种原粮下锅做粥食用,亦谓“小年下”,南村还要食用面叶汤,而且此日女儿不能回娘家,俗话说“吃了娘家米,一辈子还不起”。腊月二十三,家家张贴买来(不能说是“买来的”,要说是“请来的”)的“灶君”像,以烧饼、灶糖为供品,用公鸡活祭。二十四,为迎接新年到来,要进行一次大扫除。二十五泡豆腐,二十六杀猪宰羊,二十七宰鸡宰鸭,二十八各家门前贴上红对联,二十九制作或购买佳酒,三十日为除夕,人们在干净的室内,挂上珍藏的中堂字画,摆酒设宴,鸣鞭炮,敬祖宗,阖家团聚,守岁熬年儿至深夜。

4. 人生礼仪:人生礼仪是在人生一些重要时刻举行的活动,河南省的蒙古族同当地汉族一样,把诞生、周岁、结婚、死亡作为人生循环中的关键点。

(1)诞生礼:婴儿诞生,父母双方的亲属都要送米面;做奶奶的给婴儿准备“藏魂衫”;产妇满月后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但各地的习惯还稍有些差别。荆村蒙古族一般在小孩出生三天时,由一个门上(同一近祖的后代)的人抬着“盒子”(一种装食品的容器,圆形,上下数层)赶到婴儿的姥姥家报信儿。盒子里放面条和肉,若还有一本书,说明生的是男孩;有朵花儿,说明生的是女孩儿。姥姥家在一个月内存米面,以及